

张佩纶家藏张之洞来信流传线索补证

裘陈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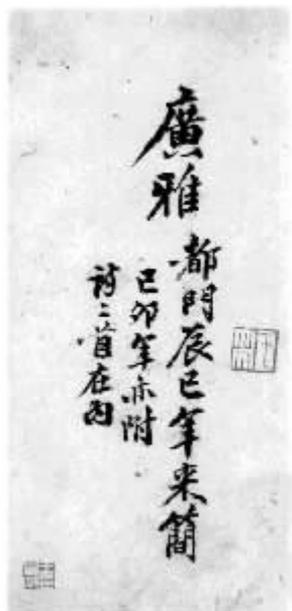
张之洞与张佩纶自光绪初年订交，在京时过从甚密，这从二张之间来往的书信以及张佩纶光绪初年的日记便可一目了然。而就两人来往书信的数量来看，现存张之洞所作的信札明显多于张佩纶的。

2月17日《文汇学人》刊载姜鸣先生系列文章，讲述张佩纶家藏信札的基本情况及其牵涉的晚清重要政事和人物，内容珍贵翔实，一时传播甚广。笔者拜读之余，对《张佩纶是如何与张之洞断交的》一节最感兴趣，并试图就张之洞致张佩纶信札的流传提供一些线索，以补证其说。

姜氏此文最大的贡献在于披露了张佩纶于1900年前后与张之洞绝交的一封信札，据称也是张氏家藏现今唯一一封二人之间的信札原件。在文中，姜氏提到张佩纶家藏信札有一个“奇怪的问题”，便是信札中独少见与张之洞之间的往来书信。而姜氏援引张佩纶哲嗣张志潜编辑乃父《涧于集·书牍》后所作跋语云：“与张文襄文书所存甚少，当壬午、癸未（1882、1883）先公在朝时，书札几无

虚日。然文襄于要函密牍不甚爱惜，随手辄散去。此集间有一二，犹系展转得自他处者。”这是张志潜对张佩纶致张之洞信札存世甚少给出的理由，此跋作于壬戌（1922）年，附于《涧于集》末尾。张佩纶家中保存如此多与友朋往来函札，对比之下，所有藏札中张之洞写给张佩纶的书信一封也没有，这的确是很奇怪的。加上二张（张之洞、张佩纶）自光绪初年以后密切的关系，这一情况显得尤为突兀。

因此在张佩纶藏札之外，姜氏也注意到王贵忱收藏并影印出版的《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书札》，就笔迹和标识而言，均为张佩纶旧藏张之洞来信原件。姜氏的转介过程中，有两处笔误，即该集中共有信札62通、诗札2通，而非68件。且姜氏标注的时间误为“光绪四年到五年”，察看《未刊书札》可知，张佩纶在这批



《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书札》张佩纶题记

信札的题识中曾自记为：“广雅都门辰、巳年来简，己卯年亦附诗二首在内。”“广雅”便是张之洞，从此题识可知均为

在都门时张之洞所作（光绪七年十二月即1882年初，张氏离京到山西就任巡抚之前），且最后二首诗札为己卯——光绪五年（1879），而其余均为庚辰、辛巳——光绪六年、光绪七年（1880、1881）写给张佩纶的。而笺注者林锐也在前言中详加考证，指出这批书信除了张佩纶所言光绪六年、光绪七年之外，尚有光绪五年下半年的信札，且现存信札次序并非按时间排列。至于这批张之洞写给张佩纶信札的流传情况，从收藏印章题记可知，信札除了张佩纶本人题记外，其余收藏标记有“王贵忱印”、“王大文”、“可园室印”、“可园长物”等，均为王贵忱、王大文父子的印章。只有一枚“莫小菱”的印章，尚未能考证是何人。因此可知这批书信从张佩纶家散出，最后由王贵忱收藏，中间流传的线索暂时不得而知。

至于王氏所藏60余封信札所提供的內容，姜氏注意到了二张早年担任清贫京官时同甘共苦的一面。而据这批信札的整理笺注者所提示，就二张交谊的事情而言，还有比“素馅馒头”所反映的清贫窘迫的京官生涯更具价值的內容，其中最主要的便是畿辅先哲祠的倡建和《畿辅先哲录》的编纂。据民国时由陈宝琛、赵凤昌等人审定，许同莘编撰的《张文襄公年谱》记载：“祠在宣武门外下斜街，无碑记。陈师傅（陈宝琛）云：光绪五年（1879），直隶告灾，李文正（李鸿藻）倡议募振款于京内外，既竣事，商之沈文定（沈桂芬），以余款建畿辅先哲祠，文定虽南人而籍隶顺天，乐观厥成。其规画一切，则公（张之洞）主之。按祠屋为刘副宪有铭故宅，稍加葺治。张颉民（张

（下转10版）➔

←（上接8版）

价值都与祖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常生活、岁时节日中的祭祖活动更通过一整套严密的仪式程序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及其伦理道德。因此，祖先祭拜礼仪有着丰富的内涵与规范。

（一）祭祖的内涵

祭祀在外有礼法，在内有涵义。就祭祀的次数而言，不可太过频繁，因为次数太多就易生厌烦；同理，次数也不能太少，因为次数太少又容易忘记。所以圣人遵照天道，根据季节的变化，规定了一年四祭。

据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四祭》记载：“古者岁四祭。四祭者，因四时之所生孰，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尝，冬曰蒸。此言不失其时，以奉祀先祖也。”古人比较重视春秋两季的祭祀。春天，万物复苏，阳气聚拢，祭祀中也仿佛将亲人迎接回来一般，内心喜悦，所以会奏乐；秋天，草木凋零，阳气返而阴气重，祭祀中仿佛又将亲人送

走，内心悲哀，所以无乐。按照祭礼，感念亲人有一套方法，即通过想象亲人在世的行止，使亲人完全回到自己现实的生活中，如同道教的“存想”修行一般。“见到”亲人又会引发“凄怆”、“怵惕”，这是一种互动的效果。

古礼也非常重视父母的忌日，认为忌日当天如同亡亲的日子，除了想念父母外，不敢有一点私心杂念做其他的事。这一天就如同在办理父母的丧事一般。由于每年都有父母的忌日，故而，孝子有终身之丧。所谓“君子生则敬养，死则敬享，思终身弗辱也”。（《礼记·祭义》）“思终身弗辱”的意思是，敬养父母、敬享父母的心一刻也不能遗忘，而是应该思虑如何能守住孝子的本分，好好地孝敬父母，所以说“君子有终身之敬，君子有终身之哀”。

祭祖是一种自尽其敬的行为，举手投足，都要必恭必敬。所谓“孝子之祭也，尽其恻而恻焉，尽其信而信焉，尽其敬而敬焉，尽其礼而不过失焉。进退必敬，如亲听命，

则或使之也。”（《礼记·祭义》）“尽其恻”、“尽其信”、“尽其敬”、“尽其礼”，这都是在讲存于心中的精神感情没有不尽心到极点的。孔子的“祭如在”，就是讲祭祀过程中如同先人真的在场，孝子的行为举止如同是在执行先辈的命令。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孝子的祭祀之道。

（二）祭祖的程序、仪容

祭祖前要做好准备，进行必要的预备性礼仪，主要包括散斋和致斋两部分。散斋七日，可以在斋室外进行，七日内不御、不乐、不吊；致斋三日，在专门的斋室进行，主要内容就是思念死者生前的居处、笑语、志意、所乐、所嗜等五个方面。致斋于内，让祭祀的人专心于所思之人；散斋于外，防止外面事物的干扰。通过三日的斋戒，因其专心致志地思念，祭祀之礼必定了然于胸，就像真的看到了所要进行的祭祀。即“致齐于内，散齐于外。齐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齐三日，乃见其所为齐者”（《礼记·祭义》）。

在神位前奠置祭饌时，孝子一定要做到“容貌必温，身必洁，如语焉而未之然”，因为先人已开始享用祭品，孝子更要谦恭谨慎，如同在他们面前侍奉听命。祭祀完毕，即送别先人后，尽管其他助祭都出去了，孝子依然要谦卑安静地站立在那里，思念亲人，就像再也看不到他们了，以此来表达孝子的送别之意。

不仅如此，等到整个祭祀仪式结束后，孝子仍然是满怀思念，望眼欲穿，就像亲人还要回来一样。所以在行为举止方面依然同祭祀时一样，行必肃，身必洁，立必卑。思虑不违亲，耳目不违心，日常生活中不敢有任何过失。如此，方能做到“事死如生”，也算真正符合祭祀的真义。

荀子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荀子·礼论》）尽管对于圣人、士君子、官人、百姓不同的

主体而言，祭祀有着不同的意义与价值，但表达“思慕之情”，寄托“忠信爱敬”则是不变的主题。

祭祀的过程是“荐其荐俎，序其礼乐，备其百官，奉承而进之”。最终达到“谕其志意”的目的。在整个过程中，祭主的一举一动都关涉到与祖先亡灵的交感，“有见乎其位”、“有闻乎其容声”、“恍惚以与神交明交”，只有祭主感知到与祖先亡灵的交感，“祭”的意义才能得到充分的实现。当然，这种庄严肃穆并具神秘色彩的祭祀仪式本身也充满了教化的意味，让后人在潜移默化中秉承“追养继孝”的传统美德。

传统祭祖对今天的人们来说，确实显得繁缛难解，特别是对祭者的行止要求，更显得苛刻并充满了神秘色彩。但是如果你思考“哲学三问”这样的终极问题，不也要面临神秘与宗教的元素吗？而我们的传统祭祖在回答这样的问题时确更显人文的情怀。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